

论1932年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和失败原因

韩琦 桑紫瑞

内容提要 1932年6月4日,智利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存在不是12天,而是102天。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改变,智利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转型的产物。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通过军人政变建立的。但与以往单纯权力斗争的政变不同,这次政变是由作为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社会党人领导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是一次民主社会主义实验。以1932年6月16日作为分界线,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分为前期“左倾时期”和后期“右倾时期”。但是,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智利施加的外部压力,新政府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缺乏一个组织严密、强大政党的领导,依靠“不流血革命”取得政权的局限性,以及资产阶级软弱和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导致革命的社会政治基础不够成熟,共同促成了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失败。尽管如此,该政权对智利社会党的建立、智利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后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再实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智利 社会主义共和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民主社会主义

1931年,智利亲美的伊瓦涅斯(Carlos Ibáñez del Campo)独裁政权倒台,^①并触发了国家的全面危机。1932年,智利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权。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格雷贝道夫将这一事件看作智利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之一,并将1931年视为与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开始社会主义实验的1970年同样重要的“关键年”。^②智利历史学家胡里奥·塞萨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是在国家发展的动荡时期发生的政治事件,对劳动人民的命运和未来具有深远的影响,对国家的政治和民主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③但是,在国内拉美史著作中,1932年智利“社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课题“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9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 ① 伊瓦涅斯是军官出身,1927年5月22日当选总统,任内实行独裁统治,逮捕和流放政治对手,取缔共产党,以官方工会取代独立工会,与美国资本合作,大量举借美国贷款,修建公共工程。但他没有预见到经济大萧条的严重性和持续性,在出口锐减和外部贷款中断后,无力控制经济和政治动荡局面,1931年7月下台。
- ② 沃尔夫·格雷贝道夫著,齐楚译《拉丁美洲向何处去》,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47—51页。
- ③ Julio Cesar Jobet, *El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tomo I, Ediciones Prensa Latinoamericana, 1971, p. 32.

社会主义共和国”往往被简要带过或直接不提,人们对此知之甚少。^①因此,笔者试图就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性质和失败原因等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始末

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短暂的革命政府。在以往国内外的拉美史著作中,它存在的时间通常被认定为12天,^②即从1932年6月4日开始,到6月16日结束。但通过研究之后,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一政权的最终结束是在9月13日,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存在的时间应该是102天。

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始建于1932年6月4日,是一次革命政变的产物。导致这次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时任总统胡安·埃斯特万·蒙特罗(Juan Esteban Montero)决定罢免空军司令马马杜克·格罗韦(Marmaduke Grove)。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引发的智利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的动荡。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智利由于受国际市场的严重影响,所有的外部贷款都被暂停并要求偿还,^③硝石、铜矿出口量锐减,^④外汇流入阻断,国家财政陷于匮乏,工人失业剧增,大量小企业主和商人破产,民众生活急剧恶化,工农抗议运动不断。1931年春,伊瓦涅斯总统颁布紧急法令150多条,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其中的新闻审查等条款,更使舆论激愤。自7月9日之后,内阁三次更迭。伊瓦涅斯为局势所困,7月26日被迫辞职,流亡阿根廷。时任内政部长的蒙特罗担任副总统,同时他呼吁举行总统选举。10月4日,蒙特罗赢得大选。^⑤

但是,蒙特罗政府既未能缓解经济危机,又无力实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实

-
- ① 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民国报刊如《时事月报》《申报月刊》《国际译报》、《国际周报》等对该事件给予一些报道。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拉美通史著作中,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林被甸、董经胜的《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曾简单提到该事件。国外学者的研究相对多一些,除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档案有相关事件的记载之外,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杰克·雷·托马斯(Jack Ray Thomas)的三篇论文:“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vol. 6, no. 2 (Apr., 1964); “Marmaduke Grove and the Chilean National Election of 1932,”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1 (Feb., 1967); “The Evolution of a Chilean Socialist: Marmaduke Grove,”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1 (Feb., 1967)。这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政变的过程、格罗韦与1933年智利社会党成立的关系、以及格罗韦本人的成长经历。作者认为,格罗韦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发挥了主导作用。Jorge Grov., *Descorriendo el velo: Episodio de los Doce Días de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Imprenta “Aurora de Chile”, 1933。该书着重介绍了政变的经过,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存在时间是12天。路易斯·克鲁斯·萨拉斯(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Ediciones Tierra Mía, 2012。该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描述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完整经历,其优点是在附录中提供了《革命宣言》《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原始文件。我们试图基于上述资料 and 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和原因做进一步辨析。
- ② 国内代表作有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285页;王晓燕《列国志·智利》,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国外代表作有Jorge Grove V., *Descorriendo el velo: Episodio de los doce días de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Imprenta “Aurora de Chile”, 1933。
- ③ 美国提供的贷款从1930年的6.82亿比索下降到1931年的5400万比索,然后下降到1933年的0比索。可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徐壮飞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8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 ④ 1932年的出口值下跌到1929年出口值的不足12%。其中,1927—1932年,铜和硝石的出口值下跌89%。可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徐壮飞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8卷,第275、276页。
- ⑤ 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和激进党人联盟选举蒙特罗为总统。激进党提名,保守党和自由党同意,蒙特罗获得64%的选票。可参见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220。

施一项紧缩计划,其中包括削减公共支出和公务员工资、缩减公共行政规模和从国外获得新的贷款。^①但货币贬值仍在继续,^②经济下滑没有停止。同时,失业率不断增加。1932 年全国失业人数猛增至 20 多万。在政治方面,由于他上台后放松了对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控制,智利共产党和“智利工人联盟”的活动日益公开化。1931 年 9 月水兵事变后,^③共产党立即声援,并派出代表接触事变领袖。“智利工人联盟”旋即号召国内大罢工,以支持事变水兵。1931 年 11 月 7 日,智利共产党和“智利工人联盟”在圣地亚哥召开共产主义大会,超过 30 个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组织的代表参加。他们向苏联致敬,派遣人员出访苏联,商讨红旗的设计和官方刊物。之后,还筹划了翌年 1 月的总罢工。此外,共产主义者还在首都街头公开进行演讲,抨击资本主义政府的不作为。^④在是否解散智利硝石公司(Compañía de Salitre de Chile,“Cosach”)和国会的问题上,蒙特罗政府充分暴露出保守性和僵化态度。智利硝石公司是伊瓦涅斯政府建立的垄断公司,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控制。当时的国会还是之前由伊瓦涅斯操纵产生的,是一个为伊瓦涅斯暴政充当橡皮图章的机构。蒙特罗不愿解散这两个机构,辩称解散硝石公司将会扰乱国内经济,而解散国会将是一项违宪行为。他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⑤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支持蒙特罗的势力开始分化。国内报刊也纷纷攻击总统、内阁,指责他们短视、摇摆、卖国。^⑥此外,不断有推翻政府阴谋的谣言传出。1932 年 4 月 27 日,蒙特罗政府下达戒严令,内政部长向各地下达指令,5 月 1 日严禁任何街头集会。到革命政变前夕,智利国内已经集结了三股反政府力量。一是由卡洛斯·达维拉(Carlos Davila)领导的一批陆军官兵,他们大多是前总统伊瓦涅斯的追随者;二是由欧亨尼奥·马特·乌尔塔多(Eugenio Matte Hurtado)领导的一批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三是由马马杜克·格罗韦领导的一批空军官兵。^⑦

达维拉是前总统伊瓦涅斯的密友,在其任期担任驻美大使。伊瓦涅斯倒台后,他立即扛起反对蒙特罗政府的大旗,获得大批伊瓦涅斯余党分子的支持。此外,他还创办了《今日报》,发表改革看法和抨击政府的不作为,使他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赢得了声誉。1932 年 5 月,他发表了《智利未被摧毁》一文,主张实行计划经济和由国家监督整个经济生活,将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收归国有,实行国家工业化等。^⑧与此同时,他联系上智利陆军军官学院的佩德罗·拉戈斯(Pedro Lagos)等军官,获得了部分陆军的支持。

① 智利政府预算从 1929 年至 1933 年大致削减了 50%,1932 年出现了 1.89 亿比索的巨额赤字。可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徐壮飞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8 卷,第 276 页。

② 1932 年比索贬值到 1929 年比索价值的 1/5。可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徐壮飞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8 卷,第 280 页。

③ 1931 年 9 月 1 日,停泊在科金博港口的军舰上的水兵举行起义,要求改善军人待遇,他们在军舰上升起红旗,解除军官的武装,但因起义领导者缺乏政治经验,最终被陆军和空军镇压。

④ “Communism in Chile,” March 30, 1932, Roll 7,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le, 1930 - 1939,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D.

⑤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 - 220.

⑥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Period March 25, 1932 to April 5, 1932, inclusive,” April 6, 1932, Roll 4,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le, 1930 - 1939,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D.

⑦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左派政党试图联合和支持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上台,但后者因国内政治混乱拒绝参政。因此,在 6 月初的革命中左派分子未能形成一个统一团体,而是分散加入达维拉和格罗韦的阵营中。

⑧ Carlos G. Davila, “Chile No Esta Arruinado,” in Carlos G. Davila, *El Presidente Davila y la Revolucion de Junio*, Ed. Sección Socialista, pp. 3 - 29.

马特是一名律师和政治家。1919年到1921年曾作为新闻专栏作家为圣地亚哥《信使报》撰文,抨击困扰智利社会的各种弊病和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宣称支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他曾当过圣地亚哥工人夜校协会的主席(1924—1931年),在劳工中很受欢迎。伊瓦涅斯倒台后,他参与创建了新公共行动党(*la Nueva Accion Publica*, NAP)。该党倾向于社会主义,提出奉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正义”的政策,要求与苏联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1932年初,他发起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主要是新公共行动党的成员参加。^①不久,马特就取得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他最初希望通过总罢工的形式实现政治目标,而非诉诸武力。但由于工人游行效果不佳,马特开始寻求武力支持,并将关注点放在格罗韦将军身上。

格罗韦是一名军官。他在海军军官学院毕业的前一年曾参加反对校方的所谓“腐败面包叛乱”,结果被开除。这一事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他宣称自己的座右铭是“对弱者和真正正义的永恒之爱”。不久他又被陆军军官学院录取,毕业后成为炮兵少尉。在德国留学5年后回国,先后担任陆军军官学院院长和空军军官学院院长。在陆军军官学院期间,他是伊瓦涅斯和阿图罗·普加·奥索里奥(*Arturo Puga Osorio*)的同窗好友,曾与前者一同参与了1924年9月和1925年1月的军事政变。伊瓦涅斯当政后,他因与之发生分歧而被派往欧洲,为刚刚起步的空军执行任务,实为流放。^②在伦敦期间,他与流亡海外的前总统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Arturo Alessandri Palma*)取得联系,^③共谋推翻伊瓦涅斯的专制统治。伊瓦涅斯倒台后,他返回国内。1932年3月,蒙特罗总统为分化军队中的伊瓦涅斯余党,保持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将格罗韦晋升为空军准将,任命他为空军总司令。格罗韦在旅英期间,英国费边社会党人威尔斯(*H. G. Wells*)对其影响至深,但是,费边社会主义反对军事干预政治,^④格罗韦则强调军队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认为军队可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⑤他是军队中改革派的代表,智利主流社会将格罗韦看作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

鉴于蒙特罗总统的信任,格罗韦起初并不支持政变,对马特发出的邀请也视而不见。但1932年4月末,军方已经达成初步协议,陆军、空军支持推翻蒙特罗政府,海军表示中立。6月2日,反政府者在佩德罗·拉戈斯上校的家中聚会,达维拉、马特、格罗韦以及一些军官出席。聚会期间,不仅讨论了智利硝石公司和国会选举问题,还涉及武力支持方面的内容。与会者决定次日拜访蒙特罗总统,告知他一旦发生叛乱,军队无法保证支持政府,并敦促他进行改革,否则军队将介入。他们还寻求民众的配合,打算在次日举行大罢工。但第二天与总统的见面会被政府方面否决。在内阁会议上,国防部部长伊格纳西奥·乌鲁蒂亚·曼萨诺(*Ignacio Urrutia Manzano*)声称他掌握了格罗韦是叛乱主谋

①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p. 70 - 72.

② Frederick M. Nunn, "Grove Vallejo, Marmaduke (1878 - 1954)," in Jay Kinsbruner and Erick Detlef Langer,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vol. 3, Cengage Gale, 2008, pp. 516 - 517.

③ 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1868—1959),1920年作为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联盟”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他的政府倾向于与英国资本合作。他在竞选时曾提出实行政教分离、男女平等、制定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等民众主义口号,但他的改革受制于国会阻挠一直未被通过,他1924年被政变推翻,1925年恢复统治后,发现自己受制于军人,再度引退。

④ 费边社会主义,英国民主社会主义之一,提倡阶级合作、反对激进的斗争;主张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通过理性政府的干预为全体公民提供福利保障,通过累进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强调“渐进的必然”,即通过艰苦工作会逐渐地却是必然地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轨道。可参见戴维·米勒等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249页。

⑤ Jack Ray Thomas, "The Evolution of a Chilean Socialist: Marmaduke Grove," pp. 22 - 37.

的证据。蒙特罗总统在与政府高级官员以及有关军官会面之后,最终决定撤销格罗韦的一切职务。下午 6 点半,国防部长电话通知格罗韦,他的指挥权被解除。至此,革命的导火索被引爆。

格罗韦接到被解职的通知后,感到震惊和愤怒。在大多数军官的推拥下,他决定采取行动,当晚便制订了空袭首都的计划,而后派代表到圣地亚哥驻军部队寻求援助。午夜时分,许多部队指挥官同意加入政变的消息反馈给了格罗韦。与此同时,政府方面任命空军副部长拉蒙·贝尔加拉(Ramon Vergara)接管空军指挥权。但贝尔加拉在空军基地遇到了军官们的对抗,他只得调动佩德罗·拉戈斯(Pedro Lagos)的陆军军官学院部队前来平叛。实际上,拉戈斯已经倾向于格罗韦,他将部队停在离空军基地一公里的地方,并与格罗韦达成一致,同意成立执政委员会(La Junta de Gobierno al País)取代蒙特罗政府。执政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格罗韦推举马特·拉戈斯推举达维拉,退休将军阿图罗·普加·奥索里奥作为两者之间的缓冲也成为执政委员人选。格罗韦向蒙特罗总统发出最后通牒。

6月4日,蒙特罗先后两次派政府代表到空军基地与格罗韦谈判,均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圣地亚哥城的大街上挤满了人群,要求推翻现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午过后,格罗韦的飞机低空飞过城市上空,散发宣扬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传单。其中宣布,国家已经处于“经济和道义完全破产”的状态,处于一种迫使军方“推翻一个……只为外国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反动寡头政府”的局面。^①蒙特罗已经完全失去了军队和民众的支持,束手无策。傍晚 7 点,格罗韦等革命军官进入总统府,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二天,革命政变者宣布了执政委员会^②的组成、新政府内阁人员的名单和《执政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并颁布了包含改组智利硝石公司、承认苏联等 30 个要点的建设国家社会主义《行动纲领》。执政委员会宣称“在履行职责时,维持司法机构的权力,并在符合新秩序的情况下,尊重共和国宪法和法律。”^③在经济方面,为应对金融恐慌的谣言,新政府 6 月 6 日颁布法令,银行放假三天,之后冻结大银行的业务。国务委员会会议决定,^④将中央银行转变为国有银行,新的银行机构应遵循有利于中小企业主的信贷政策。同日宣布,政府为失业者和贫困者每日提供两顿饭。^⑤6 月 8 日,新政府发表智利工业化计划,并设立国家统治机关,处理运输、仓库、配给、购买等事宜,下令重组农业垦殖局,收容失业工人 10 万人。财政部部长提议,用硝石换取苏联石油。第二天,政府又宣布没收本国和外国银行中的外币,可按照 6 月 3 日汇率用比索偿还。^⑥6 月 11 日,又设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实施社会化的计划。各兑换所首饰店和交易用的外币,全部由政府提取,可凭“收据”兑换为智利货币。政府从黄金店中收缴了价值 50 万比索的黄金。^⑦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共和国”颁布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和其他阶层群众的支持。譬如 6 月 7 日成立的工联主义社会党表示支

①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 – 220.

② 执政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即阿图罗·普加·奥索里奥、达维拉、马特,是集体执政,由普加任主席。但由于格罗韦掌握军权,因此,他是左右该政权的实际人物。

③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 43.

④ 国务委员会由内阁成员和相关部门的副部长等人组成,对执政委员会负责。

⑤ Raimundo Meneghella Matte, *Eugenio Matte Hurtado (1896 – 1934): Un Caudillo Socialista*. Anexo 4, p. 332, <http://www.socialismo-chileno.org/PS/origenes/NAP/tesis%20raimundo%20meneghella%20licencia%20pdf.pdf> 2019 年 7 月 15 日。

⑥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 5,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p. 437.

⑦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 5, p. 440.

持“社会主义共和国”；6月11日成立的工人革命联盟也表示支持执政委员会，^①要求对反动派采取强硬手段，推动革命进一步发展。此外，由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进步”小组在6月5日占领了智利大学中心大楼，并建立了第一个智利工农兵苏维埃。由于新政府允许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合法存在，在随后的日子里，智利共产党在包括一些大城市的全国11个地方建立起苏维埃政权。^②

新政府激进的经济措施和对共产党的宽容政策引起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恐慌。6月12日，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达维拉派策动了新的政变，但以失败告终。6月13日，国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达维拉辞职，还讨论了建立国家银行，接管前国家储蓄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职能，以及对智利硝石公司实行国有化的具体事宜。在第二天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马特根据他掌握的达维拉派阴谋的最新情况，提议组建人民民兵，向支持“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会提供武器和弹药。不过，格罗韦以有损武装部队形象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反对派认为银行改组和智利硝石公司国有化是对外国资本的侵犯，他们并未停止密谋活动。6月16日晚8点，圣地亚哥卫戍部队发动政变^③，马特和格罗韦等主要领导人被捕，理由是新政府没有履行在执政委员会事务中绝对放弃使用武装部队的承诺，并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共产主义的倾向。^④他们随后被流放到了复活节岛。

有一种观点认为，到1932年6月16日，智利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结束了。其实，政变委员会在逮捕马特和格罗韦的时候，宣布保留6月4日政府的社会改革。改组后的政府，仍然被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之后的90天中，达维拉仍然是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他实行的政策措施，有许多是继承了前执政委员会的。区别之处在于，新政府加强了对共产主义“威胁”的防范，对外国资本国有化的政策收缩了。

6月17日，政变后的新政府公布了执政委员会和内阁的名单，执政委员会仍由3人组成，除了达维拉任主席之外，还有律师出身的阿尔贝托·卡贝罗·迪亚斯（Alberto Cabero Diaz）和佩德罗·诺拉斯科·卡德纳斯（Pedro Nolasco Cardenas）。内阁也仍由11人组成，他们是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新政府上台后首先采取的措施是颁布戒严令，禁止公共集会、示威、罢工，禁止左翼出版物的发行，对新闻媒体实行审查制度。派军警围攻共产党总部，数以百计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被捕。但是，镇压并不能平息工人的斗争。前劳工部长拉蒙·阿尔瓦雷斯（Ramon Alvarez Jabalquinto）领导了长达7天的铁路大罢工，直到铁路被军队接管。达维拉失去了工人的支持，同时，也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6月25日，达维拉在电台讲话中说：“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向祖国和革命力量做出了承诺，我们将荣幸地按照社会主义制度和根据革命方案组织共和国。我们正在忠实地履行这一承诺，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不惜为之牺牲，绝不半途而废。”^⑤达维拉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重新启动了国有金矿项目，建立了一个新的商业机构。这些举措受到传统资产阶级的攻击，被他们认为是国家干预私人行动领域的措施，是“布尔什维克”的措施。为了解决国

① 这是由10多个政党和群众组织组成的联合体，其中有作为共产党非正统派的伊达尔戈派参加。

② 陈新民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6卷（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文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2—443页。

③ 新的政变者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官佩德罗·拉戈斯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④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220; Jorge Grove V., *Descorriendo el velo: Episodio de los doce días de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p. 64.

⑤ Carlos Charlin, *Del Avión Rojo a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Quimantú, 1972, p. 756.

家面临的货币问题,达维拉政府发行了一种信托货币,这种货币后来被称为“达维拉比索”。

7月7日,三人执政委员会解体,圣地亚哥卫戍部队军官会议商定,批准任命达维拉为具有广泛权力的临时总统。7月8日,达维拉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①

8月下旬,政府面临一场新的危机。政府在8月30日颁布了第532号法令,其中第1条规定设立维持生计和价格委员会,并在之后的条款中授权该委员会直接经营被其征用或干预的企业,但不包括国际垄断企业所属的经济部门,如大型采矿业、电力、电话和硝石企业。它还授权总统对基本必需品设立专营。该法令根据《1925年宪法》中规定的财产的“社会”性质,允许国家最大限度地干预智利资本主义经济。^②同时,政府还颁布了一项法令,呼吁进行制宪会议选举,政府须在120天内提交一份宪法草案,之后再确定新总统的选举日期。这样,达维拉派可以延长控制政府的时间。但是,亚历山德里派^③、海军和空军都在加紧密谋反对达维拉的活动。一些达维拉派的高级官员看到大势已去,也开始考虑自谋出路。^④

1932年9月13日,达维拉提出辞职,内政部长巴托洛姆·布兰奇·埃斯佩霍(Bartolome Blanche Espejo)被任命为“智利共和国”临时总统。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复存在,最后终结。9月14日凌晨2时,达维拉乘坐出租车离开莫内达宫。布兰奇总统无力面对来自民间和军方要求恢复宪政体制的强大压力,于10月2日辞职,并将权力移交给最高法院院长亚伯拉罕·奥亚内德尔(Abraham Oyanedel),后者呼吁在10月30日之前举行新的议会和总统选举。1932年10月30日,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及其支持者(自由党、民主党和激进党)赢得大选。智利重新走上了恢复宪政体制的道路。

二、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性质

关于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国内有学者认为,该政权(的计划)“远非是社会主义的,而仅仅是主张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资助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⑤这一观点涉及对该政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判断,但并未做出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与以往的政变不同,这次革命政变不再是一次单纯的权力争夺,而包含了现代社会变革的内容,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是一次名义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了部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革命,但其本质仍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⑥

首先,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看,社会主义思潮越来越普遍化。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智利社

① Luis Valencia Avaria, *Anales de la Republica*, Editorial Andres Bello, 1951, p. 592.

② Luis Cruz Salas, *La Repu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 63.

③ 亚历山德里派是那些在反对蒙特罗政权过程中支持由亚历山德里重新当政的人们,但当时身在国外的亚历山德里认为时机不够成熟,没有接受支持者的邀请,这一派便被马特团结过来。

④ Manuel Aranguiz Latorre, *El 4 de Junio*, Zig-Zag, 1933, p. 77.

⑤ 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第284—285页。

⑥ 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而主张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取得政权,通过有限的国有化和国家干预政策来实施公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最终以渐进的改良措施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

会思想界出现了鼓励工人谋求权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等现象。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到来,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智利的广泛传播。与自由主义主张对照,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或社会关系便被视为“社会主义”措施。那些政治反对派领导人自我定义为“社会主义者”,同时建立起各自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伊瓦涅斯独裁政权垮台和随后出现的全国性危机中,“社会主义综合了民族、兄弟情谊、平等、和平主义、工人救赎、教育和进步的思想,智利社会中越来越多希望变革的阶层都渴望实现这些思想。”^①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普遍化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其次,从革命政变的领导人构成看,他们绝大多数都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如前所述,在新政府执政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除了主席阿图罗·普加·奥索里奥是职业军人、退休将军外,达维拉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他在1932年5月通过左翼报纸《观点》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指出失业是智利面临的最大问题,工人的养老金或公共工程项目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在于建立国有企业,核心是由一家国家银行为农业、采矿、工业、运输、商业和公用事业等各个领域的国有企业融资。然而,除非有政府的全面重组,否则这家银行不能正常运作。^③这些方案充分体现了达维拉的计划经济思想。马特是亚历山德里派和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唯一领导人,他提出了名为“拉加里格计划”(Lagarigue Plan)的改革方案。其中提到,经济大危机促使智利人民觉醒,他们不再拥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摆脱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本国资本主义的枷锁。该方案主张,将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由国家控制生产、贸易和消费,同时解决人民的吃饭、住房、穿衣和教育问题。^④他的方案“代表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迈出了一步”。^⑤政变的领导者之一格罗韦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比较激进,痛恨资本主义,崇尚集体主义;要求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尊严的社会;强调社会改革,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保护他们的权利。他虽然不是执政委员会的委员,但在新政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届内阁成员中,多数是社会主义者。内阁全体成员由11人组成,包括国防部长马马杜克·格罗韦、外交与商业关系部长路易斯·巴里加·埃拉苏里斯(Luis Barriga Errázuriz)、内政部长罗兰多·梅利诺·雷耶斯(Rolando Merino Reyes)、财政部长阿尔弗雷多·拉加里格·兰希福(Alfredo Lagarrigue Rangifo)、公共教育部长欧亨尼奥·贡萨雷斯·罗哈斯(Eugenio González Rojas)、经济发展部长维克多·M.纳瓦雷特·森(Victor M. Navarrete Senn)、土地与拓殖部长卡洛斯·阿尔贝多·马丁内斯(Carlos Alberto Martínez)、农业部长佩德罗·诺拉斯科·卡德纳斯·阿文达尼奥(Pedro Nolasco Cárdenas Avendaño)、劳工部长拉蒙·阿瓦雷斯·哈瓦尔金托(Ramon Alvarez Jabalquinto)、公共卫生部长奥斯卡·西福恩特斯·索拉尔(Oscar Cifuentes Solar)、司法部长佩德罗·法哈尔多(Pedro Fajardo)。其中,财政部长和公共教育部长是教授出身,经济发展部长是工程师出身,土地与拓殖部长和劳工部长是工人领袖出身。这11人中,除了最后的司法部长佩德罗·法哈尔多是

① Raimundo Meneghello Matte, *Eugenio Matte Hurtado (1896-1934): Un Caudillo Socialista*, p. 314.

②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p. 35-36.

③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220.

④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Anexo 1, pp. 79-92.

⑤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220.

民主党人外,其他人都是社会主义者。^①他们大多都信奉社会主义主张,并参加了不同的社会主义党派,如上述外交与商业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公共教育部长都是新公共行动党的成员,土地与拓殖部长曾是智利共和国工薪阶层社会联盟党的主席。而阿尔弗雷多·拉加里格·兰希福、欧亨尼奥·贡萨雷斯·罗哈斯、路易斯·巴里加·埃拉苏里斯、奥斯卡·西福恩特斯·索拉尔、卡洛斯·阿尔贝多·马丁内斯、罗兰多·梅利诺·雷耶斯等人后来都参与了1933年智利社会党的建立。

再次,从新政府公布的政治宣言看,具有较为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新政府在1932年6月5日早上发布了《革命者宣言》,^②这一宣言字数不多,包括7个自然段,实际上是其政治纲领的浓缩。其中,第一段表明革命的对象是贪婪的外国资本主义和邪恶的寡头政府:“鉴于国家在经济和道德上已经陷入彻底崩溃,我们被迫追随我们爱国主义的冲动,去推翻一个邪恶反动的寡头政府,这个政府只为贪婪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却不顾那些迫切的集体需求,生产者阶级的苦难和无产阶级的失业与饥饿。”第二段申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为了经济解放和社会正义:“我们不受狭隘野心或仇恨的驱使:我们只追求通过建立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获得国家的经济解放和社会正义的胜利,这是一个受崇高的建设性民族主义精神鼓舞的共和国,这种精神确保所有智利人都能通过生产性工作享有生命权。”第三段表明新政权的宗旨是通过国家干预为人民服务:“我们将全力拥护新政权,为不可推卸的民众愿望服务。这个新政权将确保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规范那些生产力量,并通过有力的行动,使智利的财富重获生机,目的不是满足一个自私腐败的寡头政府,而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和健康。”第四段陈述了如何反对外国资本主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野心,这个政权必须坚持对我们财富来源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迄今为止一直被系统地交给违背集体利益的公司),从而实现我们真正的经济独立。通过建立新的秩序,我们可以远离任何帝国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影响。”最后一句话表明了该政权的中立立场。第五段提出了解决国内社会问题的方法:“目前使大批失业工人陷入绝望的饥饿、无衣、无房状况将会立即得到克服,解决办法是借助富人的财富,避免对生活必需品的投机,禁止驱逐失业的租户,并为大量失业无房者提供住房。”这一段后来被简化为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使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第六和第七段强调了这次政变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经济上的混乱、道德价值观的危机和党派之间的狭隘游戏,使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以灾难告终,要么是政权的变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选择了后者。新政权的行为将逐渐显示出它的特点,实现智利本国的利益即是它最高的和长久的理由。”这也表明该政权反对外国利益的态度。

最后,从新政府出台的《行动纲领》及其短期实践看,也没有超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1932年6月5日,即革命政变的第二天,新政府颁布了包含30个要点的《行动纲领》,^③实际上是马特“拉加里格计划”的具体呈现,其要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涉及国家机构的改革。具体包括:确定执政委员会及其内阁拥有全部公共权力;解散旧国会,研究组建制宪会议,准备制定新宪法;赦免去年9月发生在科金博和塔尔卡瓦诺的“水兵事变”中有罪士兵及其他政治犯,废除《国家内部安全法》;裁减、选拔和改组武装部队;重组司法系统;设立国家制裁法院;设立公共卫生部,并建立国家卫

① Germán Urzúa Valenzuela, *Historia Política de Chile y Su Evolución Electoral: Desde 1810 a 1992*, 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 1992, p. 471.

②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p. 93 - 94.

③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Anexo 4, pp. 99 - 101.

生服务行动署。其中,解散国会曾是革命的理由之一,因为蒙特罗政府拒绝解散旧国会,而旧国会不仅被认为是伊瓦涅斯专制政府的政治遗产,而且也妨碍新政府的革命行动。第二类涉及对外经济关系。具体包括:立即清算和重组智利硝石公司;国家垄断对外贸易;重组外交和领事服务,使其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承认苏联政府,修订与垄断进口的外国公司的合同;禁止进口奢侈品(丝绸、汽车、香水)和可以由国内制造业替代的商品;取消对阿根廷牲畜、小麦和国内食品工业原材料的税收;组建隶属于运输系统的“国营商业之家”,负责购买和销售基本必需品。其中,清算和重组智利硝石公司一条表明该政权对外国垄断资本的排斥。智利硝石公司是1930年在合并36个小公司的基础上建立的垄断公司,控制了智利硝石生产的95%以上。它建立之初,政府和私人公司各占二分之一股权,但不久之后美国古根海姆兄弟公司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占到了股权的71%。^①鉴于硝石和铜的出口占智利出口的90%,硝石出口对智利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影响极大,因此,清算和重组智利硝石公司意味着反对外国垄断资本,是革命政变的重要理由之一。另外,新政府承认苏联,表明了向“左”转的态度。第三类涉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具体包括:国家垄断黄金生产,每日开采30公斤;对碘、汽油、火柴、烟草、酒和糖专营;对所有大资产者征收不低于5亿比索的高额税;对年收入超过3.6万美元者增收补充税,对在外国的智利人增收额外税;没收外币和黄金存款,用智利比索支付。这些内容是为了稳定国家的金融形势和财政状况。第四类涉及改善民生经济。具体包括:组织对生存资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控制,以确保人口的供应。对食物的分发,可借用军队;没收无力偿还贷款或无力开发者的庄园土地给失业者,在国家技术指导下,组织集体垦殖,减免佃农的债务;^②暂停对城市中拖欠租金的小租户的清理;逐步和持续地扩大信贷的社会化;改善和扩大初级教育等。

新政府没有仅仅停留在颁布《革命者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纸面上,而是切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譬如,解散了旧国会;研究了改组智利硝石公司的问题;赦免了所有前政府时期参与叛乱的水兵和其他政治犯;建立了一个负责生活和物价管理的军需处;每天为智利失业者提供50万份免费膳食;命令大众信托银行向所有“持有失业证的人”归还他们典当的衣物和工具(缝纫机、打字机等),并下令停止对拖欠租金的小租户的驱逐。为稳定财政金融形势,新政府还宣布没收智利本国和外国银行中的外币存款,可用智利比索兑换;珠宝商店的珠宝财物为国家所用,可凭“收据”兑换智利纸币。

我们可将1932年6月16日作为分界线,把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可称为“左倾时期”。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共和国”颁布的《革命者宣言》和《行动纲领》都较为充分地表达了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主要体现在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对外国垄断资本的国有化,以及允许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合法存在,利用工人运动等方面。后期可称为“右倾时期”,政变后重新上台的达维拉政府,仍宣称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还通过了许多立法,赋予国家更多的权力来干预经济,包括建立价格、夺取和经营任何私人企业的权利等。^③但与政变前相比,达维拉在对待外国资本的政策方

^① Elisabeth Glaser-Schmidt, *The Guggenheims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Chile 1923-1934*, p. 181, www.thebhc.org/sites/default/files/beh/BEHprint/v024n1/p0176-p0185.pdf, 2019年7月15日。

^②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 39。其中提到根据“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进行土改,土地国有化。

^③ William F. Sater, “Chile, Socialist Republic of 100 Days,” in Jay Kinsbruner and Erick Detlef Langer,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vol. 2, Cengage Gale, 2008, p. 379.

面妥协有加;对外国人的利益,以及一切国际义务均表示尊重;在政治方面,镇压工人运动,取缔共产党,取缔苏维埃。

由上可见,即使在前期,不管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者宣言》或《行动纲领》,还是其出台的具体措施,重点强调的是反对外国资本的控制,通过国家干预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其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上。在这些措施中,并没有提到废除私有制,也没有激进的土地改革内容。革命政变的领导人主要是来自各个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属于中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他们并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前期虽然在《行动纲领》中宣布承认苏联,但同时在《革命者宣言》中提到“远离苏维埃主义”。革命者虽然强调政变是一次政权变更,政变也的确推翻了寡头政府,并试图改造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智利硝石公司”和银行体系,但最终并没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新政府刚建立的时候就曾宣布“尊重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因此,新政府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在后期,发生了与外国资本的妥协。达维拉曾强调,“新政府在任何形式上都不属于苏维埃体制……我们无意于骚扰现在为智利人或外国人所拥有的私人财产”。^①而被认为最激进、最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格罗韦,也否认与共产主义的任何联系。“他尽管支持社会改革,但并不主张摧毁智利的政治体制,只是希望通过改革来加强智利的政治和经济实力”。^②实际上,由于执政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革命政权存在时间的短暂,一些进步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况且随着后来政权的向“右”转,一些改革措施被终止。

总的来说,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并非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变革,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前期较为激进,后期则缓和与后退。本质上,这次社会变革并未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范畴,而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三、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失败原因

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了 102 天,实际上,在第 13 天,其“社会主义”成分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正所谓“昙花一现”。该政权何以如此短命?我们认为,当时的智利正处在由经济大危机带来的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由于社会政治基础的不成熟,这次“社会主义”实验只能以失败收场,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智利施加的外部压力。新政府的革命对象之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因为外国资本垄断了智利的硝石和铜矿出口,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外国公司要求废除出口税,改良硝石采掘方法,以减少生产成本。结果导致国家财政的匮乏,工人工资降低以及失业人数的扩大,加重了危机的程度。因此,新政府认为,智利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殖民地”。^③它的政策自然要触动外国资本的利益,并引起后者的反应。其一,当 1932 年 6 月 9 日新政府下令接管各大银

① “El Mercurio,” June 7, 1932, in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 – 220.

② Jack Ray Thomas, “The Evolution of a Chilean Socialist: Marmaduke Grove,” pp. 22 – 37.

③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Anexo 1, p. 79.

行、没收各银行外币存款等措施之后,外国商人和银行家对此强烈不满。当时曾有美孚火油公司运油船开抵瓦尔帕莱索港口,因订购者未能用外币结算,而拒绝离岸。^① 圣地亚哥的花旗银行及其他美国商家纷纷提出抗议,并请求美国驻智利大使出面干涉。在美国大使向智利政府提出严重交涉之后,新政府不得不对制定的货币条例做出修正,尽量保障外国存款者的利益。正如美国大使在其16日给华盛顿官方的报告中提及,“我建议军政府温和且公正地对待美国利益,军政府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昨天,我和军政府一同接受了电力公司员工的威胁罢工,其间我们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今日,我与军政府外交部长就银行存款和总的政策进行了非正式谈话。他强调说,他们的政策将会尊重并保护外国利益。而且,那些近来与革命政府有合约的美国公司的经理们也说自己受到了政府的公正对待。革命当局会暂时从速处理我的请求,并试图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美国政府反感的事情”。^② 其二,当6月13日国务会议批准达维拉辞职、并讨论智利硝石公司事宜时,外国人担心智利新政府会进一步左倾。14日,英国以保护侨民及英国在智利的财产安全为由,派出德班巡洋舰前往智利,18日该舰抵达秘鲁卡亚俄港,以待进一步指令。^③ 美国侨民则从13日开始采取自我保护措施。^④ 15日,美国外交部在与驻智大使的外交信件中,要求大使积极与执政委员会沟通,发挥个人影响力,说服其成员及内阁官员与外国政府及企业合作。^⑤ 在外国炮舰和外交说客的双重威胁之下,革命政府内部发生了分化,激进派格罗韦与温和派达维拉的矛盾公开化。

其次,新政府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新政府中的三位领袖政见不和。执政委员马特和国防部长格罗韦代表了激进左翼,而执政委员达维拉代表了比较温和的一派。达维拉曾是前总统伊瓦涅斯的朋友,在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曾参与古根海姆财团建立智利硝石公司的协议签订,因此,他执掌的政府很难全面实行新政府的《行动纲领》。马特原来是亚历山德里派和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他与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比较密切,《革命者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制定主要基于他提出的“拉加里格计划”。格罗韦是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与马特站在一起。因此,尽管执政委员会是达维拉和马特的联合体,但从一开始,两人在内阁人选上就产生严重分歧,达维拉建议任命胡安·安东尼奥·里奥斯(Juan Antonio Rios)为内政部长,马特对此表示反对,因为里奥斯是伊瓦涅斯时期的国会议员,马特希望授予格罗韦一个内阁职位,而达维拉不信任格罗韦的忠诚。双方最后妥协,达维拉撤回对里奥斯的提名,并接受格罗韦为国防部长,作为回报,马特同意任命普加为执政委员会主席。^⑥ 新政府成立后,达维拉享有政府发言人的角色,但他并不满意,想谋求更大的权力。而马特和格罗韦则反对达维拉增强权力和影响力。这一事实使达维拉决心摧毁由他自己建立的政府。他意识到在整个智利,尤其是在军队中弥漫着对共产主义无理性的恐惧。^⑦ 因此,他指责共产主义力量在政府内

① 《调查报告:国外之部:智利新政府接管各银行》,《财政公报》1932年第52期,第163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 5, p. 449.

③ 关于此事,1932年6月15日及19日《纽约时报》中都有消息: <https://www.nytimes.com/1932/06/15/archives/british-warship-sent-near-chile-cruiser-durban-is-ordered-to-peru.html>; <https://www.nytimes.com/1932/06/19/archives/british-cruiser-going-to-chile.html> 2019年7月15日。

④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 5, p. 440.

⑤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 5, p. 446.

⑥ Jack Ray Thomas, “The Evolution of a Chilean Socialist: Marmaduke Grove,” p. 22-37.

⑦ 当时智利社会对“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存在着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常与苏维埃、红军、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等词混用。它更多的是用于对政治、社会或经济状况不满情绪的表达,缺乏其本身所应含有的革命涵义。如失业者对收入和饥饉情况抱怨就会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政治反对派试图利用工人的不满夺取政权也会被认定为“共产主义者”。

部每天都在增长,这导致军官们为避免共产主义威胁而采取行动。^①当新政府的金融措施和对智利硝石公司的措施遭遇英美帝国主义压力之后,达维拉很快就妥协了,他提出辞职。三天后,军人政变将马特和格罗韦赶下台。达维拉再度上台之后,随即发布公告:反对第三国际,拥护祖国,以合法的手段实施社会化,个人的私有财产不能侵犯等。^②达维拉派宣称,“新革命的原因是格罗韦将军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与极左或极右相联系”。^③

再次,新政府缺乏一个组织严密的强大政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党派林立,领导力量分散。社会主义团体从伊瓦涅斯政府垮台后就开始组织起来,包括 1931 年 8 月成立的新公共行动党,领导人是马特;同年 8 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El Partido Socialista Marxista, PSM),该党在 1932 年 5 月宣布支持达维拉的计划;1931 年底成立的统一社会党(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是由革命社会党和附属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党合并后成立的;还有社会秩序党(Orden Socialista),该党受到铜矿工人的欢迎;以及 1932 年 9 月成立的社会革命行动党(LA Accion Revolucionaria Socialista, ARS)。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反帝国主义、反寡头统治,或多或少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现实的方法,并认为有必要通过中央规划以及生产与分配手段的国有化,来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④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⑤二、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迫害和内部分裂,未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智利共产党 1922 年 1 月由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而成,同时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在伊瓦涅斯执政时期被宣布为非法,力量遭到削弱。到 1932 年 6 月 4 日革命政变发生时,该党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正统派,奉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由利埃亚斯·拉斐特(Elias Lafferte)领导;另一派是非正统派,由曼努埃尔·伊达尔戈(Manuel Hidalgo)领导,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占领了智利大学中心大楼,成立了工农苏维埃和革命委员会,两派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争斗,拉斐特派要利用这个委员会反对新政府,而另一派则要全力支持新政府。最终,拉斐特派控制了革命委员会,伊达尔戈派则退出革命委员会,同其他政党一起另组工人革命联盟,并在全国建立支部^⑥。尽管智利 11 个城市建立了工农苏维埃,但工农苏维埃的群众基础并不广泛,所以,智利共产党没有提出与社会党派建立统一战线。^⑦社会党党派林立和共产党内部分裂,自然分散了各自的力量,再加上双方之间没有紧密的联合,因此不能得到工人阶级和中下层民众的有效支持,导致革命力量被削弱,反动势力得到加强。“在流亡期间,马特和格罗韦认识到,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一个在反对派出现时可以依靠的强大政党。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政党,军队就不会轻易颠覆他们的政权。”^⑧

再次,新政府缺少自己掌握的、可以依靠的有力的武装力量支撑。1932 年 6 月 4 日政变是一次没有流血的革命,革命开始于空军政变,随后得到陆军的响应,然后格罗韦率兵进入总统府,蒙特罗

①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 - 220.

② 素曼著《智利革命之颠末》,《国际译报(上海 1932)》1932 年第 1 期,第 39—40 页。

③ "The Revolutions In Chile," *New Leader*, June 25, 1932.

④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p. 30 - 32.

⑤ Benny Pollack, "The Chilean Socialist Party: Prolegomena to Its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0, no. 1 (1978), pp. 117 - 152.

⑥ 祝文驰等《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9—111 页。

⑦ 陈新民主编《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文件》,第 443 页。

⑧ Jack Ray Thomas,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pp. 203 - 220.

总统在调兵遣将失败之后,被迫交出政权。军队成为革命的工具。但是,这支旧军队中不仅有革命者,也有保守派和投机分子,特别是一些反动军官对共产主义心怀恐惧。在夺取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不得不与各种反政府势力,包括军队中的投机分子妥协,取得政权之后,革命队伍自身必然发生分化。建立新政权后,革命领袖无意改造旧军队。6月11日,为了对抗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推进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任务,10多个政党和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工人革命联盟,并要求政府向工人民兵发放武器,但这一要求未被理睬。6月14日,马特根据他掌握的关于反对派阴谋的最新情况,在国务会议上提议组建人民民兵,向支持“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会提供武器和弹药,但遭到了格罗韦的拒绝。^①后者认为,这意味着“冒犯”武装部队,格罗韦过于相信旧军队,即使在得到关于圣地亚哥卫戍部队密谋政变的报告之后,依然认为这是谣言。到6月16日晚,格罗韦发现国防部外面有部队集结,他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召集工人与军队作战,格罗韦还坚称现在采取极端措施为时过早。但当政变部队控制了莫内达宫后,格罗韦再调动他的空军已经没有时间了。

最后,中小资产阶级软弱和无产阶级力量弱小,革命的社会政治基础不够成熟。如前所述,1932年6月革命政变是在反帝反寡头口号下进行的。《革命者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承诺使智利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特别是消除硝石业中的美国垄断资本,由国家控制生产、贸易和消费,并解决人民的吃饭、住房、穿衣和教育问题。因此,在开始时得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拥护。但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并不能对帝国主义和传统寡头体制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新政府很快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当工人运动高涨起来之后,新政府便以反共的名义,镇压工人运动,迫害共产党。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力量薄弱,^②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并不成熟,它并未结合智利的国情推进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革命,错误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建立工农苏维埃的口号,结果形成两种政权体系并存的局面,这种“极左路线”不仅在大多数民众中没有得到响应,而且过早招致了资产阶级右翼的镇压。最终,资产阶级的左翼和无产阶级未能形成革命的统一阵线。6月16日再次政变后,作为资产阶级右翼的达维拉政府尽管仍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

结 语

综上所述,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存在并非只有12天,而是102天,只不过前期左倾一些,后期右倾一些。通过革命政变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与以往单纯依靠权力斗争发动政变成立的政权不同,打出了“社会主义”旗号,进行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这是一次由作为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社会党人领导的,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由于外部英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新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内讧、社会党人的党派林立、共产党因分裂而未取得领导权、新政府未能改造旧军队和建立自己的武装,说到底是由于中小资产阶级的软弱

^① 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 53.

^② 智利无产阶级主要由矿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组成。但75%的工业部门的工人是在5名以下工人的企业工作的,这说明工人的分散性。到1932年,共有421个合法工会,会员54801人,其中169个是工业部门的工会,会员29442人。工业部门会员占总会员的53.7%。由于大危机,不少人失业,工人人数也大大减少。可参见Luis Cruz Salas, *La República Socialista del 4 de Junio de 1932*, pp. 27-28.

和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成熟,最终导致这场实验失败。但是,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寡头统治,“明显地标志着寡头保守政治集团丧失了某些地盘”。^①

尤为重要的是,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以后该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格罗韦从失败教训中领悟到建立统一政党的重要性,而后于 1933 年 4 月 17 日创建了智利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②。这是一个联系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由新公共行动党、社会革命行动党、马克思主义社会党和社会秩序党合并而成的多党联盟,成为后来智利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团体之一。其次,1932 年 10 月大选之后再次上台的亚历山德里吸取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教训,为加强政府地位而组建了共和国民兵,这是一支由 5 万名训练有素的志愿者组成的正规队伍,宗旨是用武力保卫合法秩序,为按照宪法原则正常选出的政府服务。由于有这支民兵队伍保卫,军队返回了兵营,新政府实现了政治稳定。^③最后,从“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成为智利的一种传统。“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让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口号演变为人民阵线政府(1937—1941 年)的“面包、大衣和房子”的口号。它在 8 月 30 日发布的第 532 条法令中开创地对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先例,为 1970 年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所继承。

[本文作者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桑紫瑞,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杜娟)

① 沃尔夫·格雷贝道夫著,齐楚译《拉丁美洲向何处去》,第 48 页。

② 1932 年 6 月 16 日格罗韦被流放到复活节岛。达维拉辞职之后,格罗韦的支持者们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释放格罗韦。在 10 月 30 日总统大选日,格罗韦回到了智利本土,尽管亚历山德里当选了总统,得票是 184754 张,但格罗韦的选票也达到 60965 张,位居第二。格罗韦的革命经历和功绩赢得了下层民众对他的支持。大选之后,他参与了智利社会党的创建工作,发挥了凝聚智利社会党人的作用。1933 年 4 月 19 日社会党成立,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不久便成为该党的总书记。可参见 Jack Ray Thomas, “Marmaduke Grove and the Chilean National Election of 1932,” *The Historian*, vol. 29, no. 1 (1966), pp. 22 - 33.

③ Verónica Valdivia Ortiz de Zárate, *La Milicia Republicana. Los Civiles en Armas (1932 - 1936)*, Diego Barros Arana, 1992.

However , later elections were flawed by the ‘unconstitutional suspicion’ of the Taisho-Assisting Party. The suffrage of early modern Japan has continually harmonized with the Tenno-Seido , jeopardising ‘Ikkun Banmin’ . Eventually , this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revolution which happened inside , and for making it possible to open for the symbolic Tenno-Seido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Wang Chaohua , *The Contract-Protecting Principle in the Late Medieval English Labour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 , the contractual labour relation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contract-protecting principle in the labour market achieved its embryonic form. Numerous litigations on labourers survived in various levels of court rolls after the Black Death as the Statutes of Labourers were issued and implemented. These litigations indicate that breaches of contracts were common for both servants and masters , with both sides claiming their rights in the court. In this process , the principle of contract-protecting got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obtained three characters of legality , equity and universality. At the level of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 the statutes have become the basis which was referred to solve the private labour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and remedies for the contracts through the courts ensured labour contracts to be concluded and performed , and trouble-free operation of the medieval labour market as well.

Han Qi and Sang Zirui ,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Failure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in 1932*

On 4 June 1932 , Chile established a ‘socialist republic’ which existed for 102 days instead of 12 days as previously believed. It is one of results of changes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 and also the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le’s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hile was founded by a coup d’etat of soliders. Unlike previous coups , this is not a simple power contest , but a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oligarchy , and an experiment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However , it is short-lived. The main reasons for its failure are as follows: the external pressure on Chile exerted by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like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l strife of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new government; the lack of the leadership of a strong and

well-organised political party; the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team due to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additi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revolution is not mature enough due to the weakness of the bourgeois and the small strength of the proletariat. Although Chile's 'socialist republic' failed soon, i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Chile'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e's Socialist Party, the process of Chile's political democratis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re-experiment of Allende's socialism. It is a unique attempt in choosing Chile's own development path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sation.

Guo Yuan, Britain's Position concerning the Xisha Islands and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 among China, France and Japan betwee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In the 1920s, Britain regarded the Japanese presence in the Xisha Islands as its major rival because it feared such presence would threaten its maritime interests. At this time, it did not notice that France and its colonial institutions coveted the Xisha Islands and discussed about it. It was not until the 1930s when the dispute over the Xisha Island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was about to take place that Britain analysed the purpose of F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affirmed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Xisha Islands in its internal discussions, and questioned the claim of France. In the late 1930s, when Japan and France were fighting for the Xisha Islands, Britain expressed its willingness to support the French opposition to the Japanese expansion, but it took a 'non intervention' position regarding the issue of archipelago ownership, and advocated that China and France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consultation or arbitration. Although it was a backward position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ituation, it did not support France's appeal. In Britain's strategic layout of Europe and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both in a secondary position, which limited the strategic prediction and response to other countries' struggl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iu Heng, Britain's Reaction and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Indian MIG-21 Deal in 1962

Both the British an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paid high attention to the Soviet-Indian MIG-21 deal in 1962. In order to prevent India from buying MIG-21, both the Macmillan and the Kennedy